

陈旅文集版本考*

皮庆生

陈旅(1287-1342),字众仲,莆田人,其本传见《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传》。他博学多闻,游学京师时便受到翰林侍讲学士虞集等人激赏,被荐为国子助教。元统二年(1334),除江浙儒学副提举,后入为翰林应奉,至正元年(1341)迁国子监丞,次年卒,年五十六^①。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陈旅《安雅堂集》十三卷,其底本为两淮马裕藏本,馆臣曰:“其集见于本传者十四卷,此本仅十三卷,乃其子籲所编,有张翥、林泉生二序,一作于至正九年,一作于十一年。目次与焦竑《经籍志》相合,殆本传笔误,以三为四欤?”^②提要对陈旅文集篇卷的看法大体可靠^③,但说马裕藏本即陈籲所编十三卷本,仅据书前张翥、林泉生二序,及其卷数与《国史经籍志》所载相合,证据显得很薄弱。嘉庆初,藏书界出现了几种题为《陈众仲文集》的元刊残本,学者们利用元残本校勘通行本陈旅文集,并对二者的差异有所比较,但他们未看到澹生堂、文津阁等抄本,对陈旅文集的版本源流认识并不准确。今人整理陈旅文集时,虽然尽力广集诸本,但对诸本之关系未加梳理,使文集的整理质量受到一定影响^④。本文在考察今存陈旅文集诸本的基础上,结合明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阶段性成果,曾得到王茜、杨健先生的指正,特此致谢。

① 关于陈旅的卒年,《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六、《安雅堂集》四库提要等沿《元史》本传之说,置于至正三年,皆误。吴师道《陈监丞安雅堂集序》(《礼部集》卷十五)作至正二年,吴氏乃陈旅之友,是陈旅丧葬事宜、文集编纂的主要负责人,其记载当可信。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安雅堂集》卷首,另见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446 页;黄丕烈根据所获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十卷本(黄氏自题“元刻本”),也对《元史》所记陈旅文集的卷数提出质疑,见黄丕烈《士礼居题跋》卷六,“陈众仲文集十卷”条。《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 8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第 146 页。

③ 参刘兆祐:《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8 年,第 106 页。

④ 如《全元文》(第 37 册)收录陈旅集中文章 184 篇,补集外文 6 篇,但整理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陈众仲文集》十三卷(卷八至十三配以清抄本)为底本,该本清抄部分并非佳本,使得整理本不必校而校、失校处不少。

清各家著录题跋,以及2005年发现的一通陈旅所撰碑记,对陈旅文集的编纂历史、版本源流、诸本优劣等问题略加探讨,尚乞方家不吝赐教。

一、陈旅文集的编纂

同四库馆臣一样,几乎所有学者均认为陈旅文集的初次编纂者是其子陈籲,这是不对的。其实,第一位编纂陈旅文集的是陈旅好友吴师道,他为所编定的文集写了一篇序,可惜该序未收入传世的陈旅文集中,尚未得到学者关注。

吴师道在序中深切地怀念了两人的友情,对陈旅的文学成就评价也很高,但该序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陈旅丧事与文集编纂的叙述。至正二年(1342)七月,陈旅卒于京师,中书左丞许有壬主持丧事。因陈旅家贫,王思诚率国子监同僚捐资助丧,家属将他安葬在杭州。“湖广行省参政苏公,时亦戒行,嘱某曰:陈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传,则朋友之力也。异时吾能使之传,子盍哀集之。”苏公即苏天爵,字伯修,《元史》卷一八三有传。据《至正集》卷三四《送苏伯修赴湖广参政序》,“至正壬午夏,(伯修)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大夫士又分题赋诗以饯。”也就是说,陈旅去世不久,其友人就开始考虑编集其诗文集了。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吴师道“访于其家,则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传录而后出。久之,始自南寄来,大抵非完稿矣。因而为之序次,诗文等总若干篇,釐为十卷。”^①陈籲似乎不太积极,文稿为人借留是否托辞已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陈籲扶柩赴浙,葬其父于杭州,返回莆田故里,路上携带着父亲的文稿。而吴师道说他收到的“大抵非完稿”,或许是在间接地表达心中的不满。吴师道收到诗文大约是至正三年三月之前,因为他随后就因丁母忧回到婺州兰溪故里。他将陈旅的诗文加以“序次”,釐定为十卷,应该做了一些编辑工作,并将文集定名为《安雅堂集》。据金华本《礼部集》,吴序撰于至正四年(1344)三月九日,五月之后吴师道卒于家。陈籲应该看到了吴师道所编定的《安雅堂集》和序,数年后他向张翥出示的陈旅文集即是《安雅堂集》,这不可能是巧合。那么,为什么陈籲弃吴序而不用呢?恐怕不是吴师道对陈旅文学评价不高,而是他在序中委婉地提到陈籲对文集编纂的不配合,尤为重要,吴序花了较大篇幅谈到陈氏家贫靠众人捐资才得以安葬的凄惨景象^②。陈籲不愿将不堪回首的一幕永久置于父亲的文集之首,亦在情理之中。

陈旅文集的第二个版本是通常所说的陈籲所编十三卷本,书前有张翥和

①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五《陈监丞安雅堂集序》。《全元文》第3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②国子司业王思诚说“陈君贫,加厚可也”,“于是辍餐钱二日,诸生复相率出钱,凡得五十缗,合其家所得,贖倍而贏若干,以其贏给丧费,谋归葬莆中,则道险远。君尝爱钱塘山水,将老焉,嘱曰:葬钱塘可。适参政冯公赴官浙省,司业君以告,公忻然许为卜地西湖上,乃以其钱四之一俾其家蹴车船,其三则委之冯公,葬毕而归余费焉。”陈旅之贫穷,由此可知。

林泉生序。张翥和吴师道一样,也是陈旅在国子监的僚属和友人。他在至正九年(1349)奉旨赴闽浙沿海代祀天妃,“询其子籀,得家藏全稿,曰《安雅堂集》,凡十三卷”,“因籀之请,乃书而冠诸集首”。张序对陈旅诗文评价很高,云“方天历至顺间,学士蜀郡虞公以其文擅四方,学者仰之,其许予君特厚,君亦得与相薰濡,而法度加密焉。故其所铺张若揖让坛坫,色庄气肃而辞不泛也;其所援据若检校书府,理详事覈而序不紊也。其思绵丽藻拔而杼机内综也。其势飞蹇盼睐而精神外溢也。”^①两年之后,陈籀又请林泉生撰序,林序云:“君之子籀哀辑成书,吾友张仲举既序之矣,籀复求予言,予以众仲之文不患不传于后世,患知之者未尽其蕴,因籀之请,遂附予言于仲举序后。”^②林泉生自称张翥之友,也有诗文唱和,当知张翥两年前已经为陈旅文集撰序,为什么要再撰序文呢?林序值得注意之处有二:一是高度评价了陈旅的治事能力、学养,从文章与世道、元代诗文演进的角度评价陈旅的文学地位,认为陈旅“自成一家,超轶古昔”,“不十年而众仲之文满天下”,颇有过誉之嫌;二是明确了《安雅堂集》的编纂者,明言“君之子籀哀辑成书”,《安雅堂集》是由陈籀编纂而成。林说与张序显然不同,张翥只是含糊地说“得家藏全稿”,他是吴师道的好友,应该知道吴氏编纂文集之事,甚至可能看过吴序,“全稿”或许是相对吴序“大抵非完稿”而言,只认可陈籀增补了一些诗文,与“哀辑成书”有很大区别。可惜后人未注意到吴序的存在,亦未细察张、林二说的差异,于是陈籀首纂《安雅堂集》之说遂成定论。另外,全稿《安雅堂集》的卷数亦有疑问,文渊阁本张序作“《安雅堂集》,凡十三卷”,这也是馆臣认为陈籀所编文集为十三卷的依据,与之相同的还有明澹生堂抄本、四库荟要本,以及通行诸本。而几种元刻明修残本的张序皆有残缺,没有“《安雅堂集》凡十三卷”一句,与之出一源的清初金侃抄本(详后)作“凡□卷”,文津阁本则作“凡若干卷”,文献有阙,尚难下断语。

陈旅文集编纂情况比较清楚的是第三次,即明人邵铜所编《重编安雅堂集》十三卷本,澹生堂抄本和马裕藏本皆源出该本。邵铜,福建闽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监察御史,因弹劾权宦曹吉祥、石亨下狱免官,传见乾隆《福建通志》卷四三。成化二年(1466),邵铜任温州知府,见乡先贤陈旅的旧版文集,“编次无伦,字画亦多舛讹,诗文又有缺漏,加以岁久漫漶,读之不能终篇者比比。兹因公暇,重展旧卷,参互考订,无伦者类次之,舛讹者校正之,缺漏者补录之,定为一十三卷,名曰《重编安雅堂集》,存旧也。”^③邵铜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各卷诗文的篇次做了较大调整,尤其是前三卷的诗,旧本各体混在一

①张翥序见诸本《安雅堂集》或《陈众仲文集》卷首,又《元史》本传对陈旅的评价与之相似:“旅于文,自先秦以来,至唐、宋诸大家,无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洁,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

②林泉生序见诸本《安雅堂集》或《陈众仲文集》卷首,元刻明修本(残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错页。

③邵铜《重编安雅堂集》序,见澹生堂抄本《安雅堂集》卷首。

起,重编本将之分为赋、辞、操、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排律,诸体序次井然;二是校勘,将澹生堂抄本与元刻明修本略加对校,即可发现邵铜所言不虚;三是增加了诗文若干篇,如果将澹生堂抄本(参考荟要、文渊阁本)与残七卷元刻明修本(参考同一系统的金侃抄本、文津阁本前三卷)相比对,重编本内容不增反减(详后),仅在卷五增“宋景濂文集序”、“郑涛字序”二文而已,二者为浙江籍人士所撰,重编本将之分置卷五首尾,是否有任职地域方面的考虑,则不得而知。

二、陈旅文集的刊刻与流传

按照清人的看法,陈旅文集的刊刻情况似乎并不复杂,先后仅两次,即元刻与明刻,分别由陈籲、邵铜主持。陈籲所刊名《安雅堂集》,应该在至正十一年(1351)林泉生撰序之后,全书卷数不详(通说为十三卷),其版至明代前期尚存^①。宣德三年(1427),陈珪给《翠屏集》写的序中说:“今诸孙南雄教官隆复以使安南稿续板行世,先生著述至是始克全见。文采烂然,足以垂后著世,与陈之《安雅堂集》、林之《觉是集》并传无疑矣。”^②尽管陈氏是在讲张以宁《翠屏集》的板行,也透露出《安雅堂集》已刊行传世。杨士奇(1366-1444)《东里集》卷十《跋安雅堂文》也谈到,“《安雅堂集》,闽陈旅众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学,予家贰册得于翰林庶吉士洪遵道。元之时,闽人以古文名者,众仲其巨擘也。”洪顺,字遵道,福建怀安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授翰林庶吉士^③。杨士奇在正统六年(1441)参与编成的《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陈众仲《安雅堂集》一部,二册”,与其家所得者册数相同。成化二年(1466),邵铜根据福州府学刊刻的“旧板”,重编《安雅堂集》十三卷,并立即“遂捐俸募工,绣梓以传。”此后,陈旅文集未见重刻,康熙年间长洲顾氏刻《安雅堂集》一卷,只收录了陈旅部分诗作。

关于陈旅文集的流传情况,兹根据明清官私藏书目与题记、《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等文献的记载,列举如下:

《安雅堂集》,无卷数,分见《文渊阁书目》卷二,《宝文堂书目》卷上,《传是楼书目》;十三卷,刻本或抄本,分见《百川书志》卷十二,《澹生堂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卷五,《千顷堂书目》卷十五,《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文选楼藏书记》卷六,《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二,《善本书室藏书记》卷三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五著录今存明清抄本六种;十五卷,见《绛云楼书目》卷三;七卷,见《传是楼书目》。

①杨士奇:《题安雅堂集》,见澹生堂抄本《安雅堂集》卷首,并见杨士奇《东里集》卷十《跋安雅堂文》。

②陈珪:《翠屏集序》,见《翠屏集》卷首。

③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一《三山明初诸先生学派·冯顺》。

《安雅堂文集》五卷,清康熙三十年金侃抄本^①,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五;十四卷,见《韶宋楼藏书志》卷一〇二。

《安雅堂诗集》,见《百川书志》卷十五,不言卷数。

《陈众仲集》,四卷,残元刻本,见《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②。

《陈众仲文集》,七卷,残元刻本,见《尧圃藏书题识》卷九^③;十卷,并见《尧圃藏书题识》卷九,《韶宋楼藏书志》卷一〇二。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陆各图书馆(主要是国家图书馆)尚藏有13种陈旅文集,而韶宋楼所藏两种皆入藏日本静嘉堂^④,如果加上港台、海外的收藏,今存陈旅文集的刊本、抄本应该有20种左右。传世陈旅文集,以抄本为主,可以确知的刊本仅四种,皆为元刊明修本,且为残卷^⑤。四种刊本的题名作“陈众仲文集”,但自杨士奇以来的诸家著录,皆作《安雅堂集》或《安雅堂文集》,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有必要加以解释。

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明代至清初学者、藏书家提及陈旅文集时都称为《安雅堂集》,前引吴师道、张翥、林泉生、杨士奇、邵铜等人的序跋也说明,三次编纂、两次刊刻的陈旅文集均名为《安雅堂集》,应该不存在书名混淆的问题。邵铜序“名曰重编安雅堂集,存旧也”一语,似乎成化二年刊本作《重编安雅堂集》,据祁氏澹生堂抄本,则书名实未改动,仍作《安雅堂集》。《陈众仲文集》之名见于著录在嘉庆初,黄丕烈获钱大昕所赠《陈众仲文集》残七卷本,次年(1802)写了一则识语:“此元刻《陈众仲文集》七卷,潜研堂藏书也。辛楣先生于辛酉岁与明翻元刻本同以遗余,虫伤水湿,不可触手,顷付装池,仅取元刻,列诸《所见古书录》甲编中,谓此半璧之珍,世所未见耳。”^⑥明翻元本《陈众仲文集》的题跋亦载于《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原为周永年所藏,后转赠钱大昕,从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介绍来看,其篇次、篇名、版式与七

①原为周叔弢藏书,周叔弢《自庄严堪书目》善十一,见《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652页。

②后归周叔弢,并捐赠国家图书馆,见《古书经眼录》,第615页。

③后归铁琴铜剑楼,1950年之后入藏国家图书馆。

④《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这两种陈旅文集,分别为:《陈众仲文集》,一三卷(卷六一九缺),元刊(明修);《安雅堂文集》,一三卷,写本。篇卷与版本与《韶宋楼藏书志》略有不同,又据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静嘉堂所藏《陈众仲文集》乃九卷残本,鉴定为元至正刊明递修本,各卷卷首书名不一,“陈众仲文集”、“安雅堂集”、“陈众仲安雅堂集”皆有,其篇卷与残元四卷、七卷本相同,应同出一源。分见诸桥辙次:《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静嘉堂文库,1930年,第699页;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1623页。

⑤刘兆祐云:“是集今所传者,多明刻本或钞本,元本罕见。”实则明刻比元本还少。见刘兆祐:《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第106页。

⑥识语原附至正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卷一之后,并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

卷本相同,不知黄丕烈为何要将二者区分为元刻与明翻元本。大约在同时,吴騫也为自己所藏的残四卷本《陈众仲文集》写了两则题记:

按:《千顷堂书目》,陈旅《安雅堂集》,十三卷,今世行本大率相同。予旧藏此元刻本二册,曰《陈众仲文集》,考诸家簿录,皆未见有此目,未审其同异若何。卷首林泉生序作于至正辛卯,距众仲之卒已十年,当是其子籲最初刻本,虽仅存四卷,而诗则已全,零编蠹简,何可不什袭珍之。

元百家选诗小传《安雅堂集》一百廿四首,元刻《陈众仲集》一、二卷一百六十九首,三卷一百五十九首,通计三百二十八首,较《元诗选》多二百四首。^①

吴騫注意到四卷残本书题的特异之处,“考诸家簿录,皆未见有此目”,认为是陈旅之子籲的“最初刻本”。四卷残本较七卷残本的文字清晰,所以黄丕烈认为是更早的印本,并借校一过^②。由于有黄、吴二人的揄扬,这部当时被鉴定为元刊的《陈众仲文集》很受学者们重视,季锡畴、钱天树、王振声、李兆洛、叶昌炽、傅增湘等人都在两个残本上留有题跋^③。不过,这些题跋多强调《陈众仲文集》对于校勘通行本《安雅堂集》的价值,至于“审其异同若何”的细致工作则很少,偶一为之,亦开口便错。如季锡畴有云:“《众仲集》明刻作《安雅堂集》,文十卷,编次略同。惟诗三卷全异,元刻编年,诗亦较多,明则分类,原注亦多漏落,此元本之所以足贵也。”元刻本的诗随意排列,无规律可寻,绝非编年^④,而比较能反映明刻本《安雅堂集》面貌的祁氏澹生堂抄本较元刻残本收诗总数还要多一首^⑤。

其实,只要将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元刻明修本略加比较,便不难发现三者版式相同,均为半页 10 行 20 字,黑口,左右双边,只是残损程度、字迹的清晰

①见四卷本《陈众仲文集》卷首,并见吴騫:《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23 页。

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

③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陈众仲文集》七卷残本,版式与吴、黄藏本同,但没有任何题跋,来历不明。这个本子残损严重,版心皆缺,但正文存留之字迹却十分清晰。王振声提到“近闻塘栖劳氏亦有之,然亦止七卷。”不知是否此本。见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七卷残本卷一之末。

④随举一例,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卷三《送赵子期使交趾》,据《道园学古录》卷二《送南官舍人赵子期宣诏交趾》,其时当在至元元年(1335),而《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至元元年五月丙戌条云“诏遣使宣谕交趾”。相隔十一首,有诗曰《送左卫教授马伯诚还湖州》,马彦恂,字伯诚,事迹不详,他奉命与修《经世大典》,修成之后回湖州,京师诸人赋诗送别,除了陈旅之诗,另见《燕石集》卷七《马伯诚以缮写经世大典成书授左卫教授须次暂还吴兴》,《伊滨集》卷九《送左卫教授马伯诚》,而《经世大典》之成书,《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系之于至顺二年(1331)五月。

⑤祁氏澹生堂抄本《安雅堂集》卷二有《与陈敬初同舟北游题饯行》一诗,几种元刻明修本均未收。

度有差异而已。而从每卷的篇题、版心的情况来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吴騫、黄丕烈的元刊本修订为“元至正刻明修本”还是比较妥当的。这个本子每卷卷首、首末、版心的题名很不统一,几乎每卷都不一样:

	卷首书名	卷尾书名	版心题名
卷一	陈众仲文集卷第一		陈众仲集卷一,众仲赋,陈众仲集卷一
卷二	陈众仲文集第二卷		陈众仲集卷二、众仲集卷二;安雅堂集卷第二(11、12页)
卷三	陈众仲文集卷第三		陈众仲集
卷四	陈众仲文集卷之四		陈众仲文集卷四
卷五	安雅堂集卷第五	安雅堂集卷第五终	安雅堂集卷第五
卷六	安雅堂集卷第六	陈众仲文集卷第六	安雅堂集卷第六
卷七	陈众仲集卷第七		安雅堂集卷第七;陈众仲集卷七、众仲文集卷七(卷末6页)

如前所述,元末人称陈旅文集皆作《安雅堂集》,文集之名直指其父之字也不合常规,而卷首、首末、版心题名之混乱更不是孝子为父亲刻书应该出现的,所以,这个《陈众仲文集》绝不是陈旅之子籲的“最初刻本”,而是元刊《安雅堂集》的修补本,是陈旅文集的第三个本子。只不过大部分修补本是针对原版内容的残缺漫漶处,《安雅堂集》明修本却意在改易书名,而且做得很不高明,修补之处格式极不统一。而卷二、五、六、七保留下来的书名皆作《安雅堂集》卷第几,与明修本形成鲜明对比。四卷残本有沈麟的一则题跋,云:“众仲集不多见,嘉靖丙申,偶得此元朝旧本,因手录其传于前,以识岁月,七十二翁竹东沈麟书。”如果这则题跋可靠,那么元刻明修本至少在嘉靖十五年(1536)就已经出现。其上限大约在永乐二年(1404)杨士奇从闽人冯顺处得到《安雅堂集》,甚至可能比成化二年(1466)邵铜重编并刊刻《安雅堂集》还要早(详后)。这应该是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刊印的大致时间,至于刊印者为何要做这样的“修补”,已无法得知。

三、陈旅文集诸本之关系

如上所述,陈旅文集先后刊刻过三次,即至正年间的元刻本、成化二年的明刻本,以及永乐至嘉靖之间的元刻明修本,后两种本子都源出元刻本,但明刻本对元刻本的改动更大一些,元刻明修本与明刻本的关系尚须进一步考察。今存陈旅文集的各种抄本、刻本都是从这三个本子变化而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整理陈旅文集,有必要对诸本之间的关系略加梳理。

三个本子之间,元刻与元刻明修本关系最为密切。今存陈旅文集诸本中,最接近元刊本的是康熙三十年(1691)的金侃抄本,书后有金侃跋语云:“辛未闰七月望前二日,雨窗录,福建板刻最丑,又系元本,岁月既久,漫漶几不可识,

中多阙文,候善本校补之,编端尚有晋安林泉生序,逸未录也。”^①金侃抄本仅一至五卷,半页11行,行21字,其目录、各卷首尾皆题书名曰《安雅堂文集》。前三卷为赋、诗,卷四、五皆为序,与元刻明修本相同,具体篇目卷一、二、五几乎完全一样^②,卷四比元刻明修本少《西山诗序》,这是卷三《西山诗》(各本同)诗序的重出,是元刻明修本补入还是元刻原有而金侃未抄,很难判断^③。二本差异主要是卷三,金侃抄本有三处共40余首诗与元刻明修本位置不同,还多了16首诗^④。如金侃抄本《送陈信仲泉州教授》与《题幽禽桃花图》之间有《元宵怀钱唐》等6首诗,元刻明修本6诗全佚,代之以《庞氏遗安堂》等7首诗,这7首诗在金侃抄本插入《送临川讲僧》与《赋梅雪斋》之间,而元刻明修本这两首诗是相连的。金侃抄本卷末的《水仙花图》等20首均不见于明修本卷三。正是基于以上考察,笔者认为金侃抄本很可能是所有抄本中唯一录自元刻本的本子,而元刻明修本对元版稍有修订,对错版、缺页、夺字问题做了一些处理,但正文改动很少,也是十分接近元刻面貌的本子。

那么,邵铜在成化二年重编《安雅堂集》依据的是哪个本子呢?由于明刻《安雅堂集》已无刻本传世,我们只能根据较早的澹生堂抄本来考察。澹生堂抄本《安雅堂集》共十三卷,而金侃抄本仅五卷,明修本也只有七卷,以下只比较前七卷的内容。前三卷诗赋部分改动最大,金侃抄本、明修本的诗诸体混杂,其编排规则无章可寻,而澹生堂抄本则将之区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排律,秩序井然。值得注意的是,澹生堂抄本诸体诗的顺序大体与明修本相同^⑤,偶有漏抄后补抄的现象^⑥。澹生堂抄本

①金侃跋语,见康熙三十年金侃抄本《安雅堂文集》书后。

②本卷五完全相同。金侃抄本卷一《题萱草图》、《题秋山图》、《题玉簪花图》、《题白玉蟾赠刘丹晨暑月诗后》四诗与元刻明修本顺序不同,最后一首有目无诗,应属抄录时的失误。卷二诗篇相同,惟文字有差异。

③金侃抄本与明刻本系统诸抄本卷四皆无《西山诗序》当为元刻重出,元刻明修未改,明刻及诸抄本将之删除。

④这16首诗是:《元宵怀钱塘》、《和康庸田鲁瞻公言怀韵》、《江城即事》、《送董尊师》、《题罗稚》、《与陈敬初同舟北游题饯行卷后》、《寄张起原》、《送宋太监海上祀天妃》(二首)、《寄陈克谦》、《钱舜举画木芙蓉》、《次韵答都下友人》(二首)、《次韵阮秀才游闽中古寺》、《送泽天泉上人》、《吴宗师赤城阻雨次甘泉韵》。另金侃抄本比元刻明修本少《题庆元大瀛海道院图》,可能是漏抄。

⑤这里所说“澹生堂抄本诸体诗的顺序大体与明修本相同”意指澹生堂抄本每一体裁的诗之间的先后排序与元刻明修本前后顺序相同。

⑥如五言绝句,各诗在明修本的顺序依次为:卷一:11、35、12、52;卷二:29、35、37、49、55、60;卷三:104。七言绝句,各诗在明修本的顺序依次为:卷一:54;卷二:2、4-11、20、24、27、31、36…、71、73,卷三:68;其后又从卷二第42首补抄51首,与明修本卷二、卷三顺序完全相合。

每遇明修本错版即按明修本的先后顺序,缺页处亦直接跳过。如澹生堂抄本的七言绝句中《北席里石氏节妇汾州》、《庞氏遗安堂》、《赠武夷张天根》、《题幽禽桃花图》四首诗先后相连,而金侃抄本《庞氏遗安堂》、《赠武夷张天根》置于《题幽禽桃花图》之后;又如卷二《程氏竹雨山房》、《题王氏竹石图》两首七言律诗据金侃抄本当置于《送临川讲僧》、《赋梅雪斋》之间,而澹生堂抄本却将之置于《送临川讲僧》的14首之前,随后接以《赋梅雪斋》,这又正好符合明修本的顺序。另外,元刻明修本所佚16首诗,祁氏澹生堂抄本缺15首,存1首,置于卷二末尾,这是否属于“缺漏者补录之”?已无法确证。澹生堂抄本卷四将明修本重出的《西山诗序》删除,卷五首尾增加了《宋景濂集序》、《郑涛字序》二文,卷七将明修本《群玉内司华直题名记》、《上都分学题名记》二文从卷中移至卷首。从上面的论证来看,明刻本重编《安雅堂集》所依据的是元刻明修本,而不是元刻本,这也正符合邵铜在序中所说的“旧板编次无伦,字画亦多舛讹,诗文又有缺漏”,只不过邵铜做的工作主要是对诗歌重加编次,补录的诗文并不多。嘉庆年间黄丕烈等人以元刻明修本为珍藏,给人的感觉是明刻本《安雅堂集》更为常见,公私藏书著录陈旅文集为《安雅堂集》似乎也能支持此说,但元末明初的两部诗选则说明事实不全是如此。康熙年间顾嗣立《元诗选》不细分诗体,所选陈旅诗126首,其顺序与元刻本基本吻合,明修本失载的诗大部分都按元刻本的顺序收录进来,所依据的底本应该是元刻本^①。明末清初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二四三所选陈旅诗,共63首,分为五言诗、七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以情理度之,应该以明刻本《安雅堂集》为底本,以省功力,毕竟明刻已将陈旅的诗分为五言、七言等,可是曹学佺依据的却是元刻明修本^②。本文无意用两部诗选所依据的底本来推翻黄丕烈等人的观点,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公私目录著录的本子可能并非常见本,常见本随着时代变化也可能成为稀见本^③。

明刻本系统除了澹生堂抄本,还有源出马裕藏本的两个抄本:《四库全书

①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三七。

②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传见《明史》卷二八八,其编纂《石仓历代诗选》在崇祯初年辞官家居乡里之后。收五言诗17首,分别出自《安雅堂集》前三卷,其先后顺序与元刻明修本完全一致,与澹生堂抄本不同。七言诗所选《明妃出塞图》至《海谷》四首,与元刻明修本卷一诗序同,其后为《谢征君松巢》至《送朱运峰著书得官南归》共10首,当为发现缺漏后补选,亦与元刻明修本顺序同。其后《和维扬友人诗》以下,至《董定宇赋杏林诗》,分见卷二、三,顺序与元刻明修本同。《题虞先生词后》以下皆为七绝,共18首,与文津阁本顺序同,其在澹生堂抄本的顺序则为:18、21、29、68、44、46、47、39、41、53、54、57、60、71、83、84、86,显然不可能选自澹生堂抄本所属的明刻本。

③钱大昕对元刻明修本的态度也耐人寻味,他在《补元史艺文志》卷四著录有“陈旅《安雅堂集》十四卷(一作十三卷)”,该书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16年之后,他将一部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转赠给黄丕烈。

荟要》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刻本、马裕藏本原书不见,我们只能将两个四库全书抄本与澹生堂抄本进行比较。先来看荟要本:该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与澹生堂抄本的篇卷顺序完全一致,但澹生堂抄本卷十三的最后一篇为《书野鹤记后》,其卷首目录亦如此,荟要本其后还有25篇文章,虽然本卷以“杂文”之目统之,但卷末的这些文章还是有体例前后混杂之嫌,这些文章是四库馆臣收集遗文,缀于书末,还是明刻本有而澹生堂抄本依据的底本已缺呢?我们发现澹生堂卷三的前七首诗皆缺(目录亦无七诗篇名),第8首《赋谢氏舒啸亭》缺前半部分,卷三之首就是一篇无篇名之残诗,抄本有抄后校勘过的痕迹,所以,澹生堂抄本的缺诗、缺文很可能是其所依据的明刻本已有残缺所致,荟要所依据的马裕藏本比澹生堂抄本的底本更全,所以《书野鹤记后》多了25篇。除了诗文篇数的差异,二者文字上也有不同,荟要本将诗文中的辽金元人名翻译一一改译,并于卷末附有校记,如卷二之后云:“谨案,卷一第三页前二行富珠哩旧作李术鲁,今改,后仿此。卷二八页后五行多尔济旧作朵儿赤,今改,后仿此。”卷八之后:“谨案:卷七第一页后二行库库旧作夔夔,今改,后仿此。二十六页前五行克呼旧作怯来,今改。”荟要本也有很不严谨的地方,底本有缺字,编校者以意填字,如卷八《致亭记》:“先生为学,犹农夫之治穡事,自见其获矣,吾不可不致力于学乎。致道闻之曰:吾之心,原非欲致进士而止也。”文渊阁本五字阙,当是原本如此,据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五字当为“也勤”、“之所学”,应该是荟要本臆补缺字^①。

文渊阁本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半叶8行,行21字,与荟要本版式相同,篇目顺序也一样,但是缺抄卷三之末的《题秋山图》、《次韵陈景忠见寄》二诗,卷十三最后的《祭镜助教文》一文。荟要本改动的译名,文渊阁本径录之,并将校记删除。但是,文渊阁本的提要与荟要本相比有较大修改,各篇文字有不少差异,二本对于底本阙字的处理,有的地方是文渊阁本将阙字空格,而荟要本以意补之,有时则相反^②。另外,卷首林泉生序,荟要本不误,而文渊阁本有错页,从字数来看,所错之页与荟要本版式不同,应该是二者所依据的底本之页。

《四库全书》系统的《安雅堂集》还有一个特殊的抄本,即文津阁本,已有学者注意到该本与文渊阁本相比“卷一至三诸诗,两本编次大异,卷十三津本

①《全元文》点校本作“先生为学,犹农夫之治穡事也,今其获矣,吾不可不致力于学乎。致道闻之曰:吾之学,非欲致进士而止也。”

②如文渊阁本卷六《王平章文集序》云:“传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夫行,本也,辞从而生者也。徒有其辞,又蔓衍而披张之,□□之本也益远矣。”荟要本作:“传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夫行,本也,辞从而生者也。徒有其辞,又蔓衍而披张之,其失乎本也益远矣。”若文渊阁本以荟要本为底本,不当有缺字。又,“□□之”,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作“其去”。总的来说,文渊阁本保存阙字空格较多,荟要本臆改严重一些。

多《祭镜助教文》”^①，惜未进一步分析其版本源流。文津阁抄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版式与荟要本、文渊阁本同，其提要采用的是荟要本（仅一字之差），而非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前三卷诗赋，篇目与元刻明修本一样，文字偶尔差异，有漏抄现象^②。卷四至十三的篇目与荟要本完全相同，但译名均从原刻，未予改动，荟要本、文渊阁缺字处皆补全，大体与澹生堂本同，偶有臆改处。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四库全书》三个《安雅堂集》抄本的版本关系：文渊阁本、荟要本都是根据同一底本，即马裕所藏明刻本抄录的，前者应该参考了后者。文津阁本应该是两个本子拼合而成，前三卷的底本为元刻明修本，后十卷则录自明刻本（极有可能是马裕藏本），并参考了其他传本补录缺字^③。

四、余论

本文对陈旅文集版本的讨论，主要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五种善本：元刻明修本三种、澹生堂抄本、金侃抄本，《四库全书》的三个抄本，并参考了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清抄本（分别为黄丕烈、傅增湘所藏），日本静嘉堂所藏元刻明修本未能寓目，只能据他人著录分析，颇为遗憾^④。通过对上述十个刻本、抄本，以及明清书目、题跋等文献的初步分析，可知陈旅文集先后经过三次编纂（吴师道、陈籟、邵铜）、两次刊刻、加一次修版（元刊、元刊明修本、明刻），金侃抄本源出元刊本，元刊明修本则有四种刊本残卷传世。邵铜重编《安雅堂集》所依据的是元刻明修本，他所说的书名要“存旧”，表达的或许是对元刻明修本更名《陈众仲文集》的不满。明刻本有澹生堂、荟要本、文渊阁本等抄本。文津阁兼承元刊明修本和明刻本，是最能反映陈旅文集原貌的本子。

笔者曾抽校若干篇诗文，发现文津阁本的诗赋部分与元刻明修本一样，最接近金侃抄本，如卷一《琼芽赋》，澹生堂抄本、荟要本、文渊阁本“吐層花以当春兮”一句金侃抄本、元刻明修本残卷、文津阁本皆作“吐曾华以当春兮。”文津阁本后十卷收文最全，且参校了某个善本，其版本甚至优于澹生堂抄本。如卷四《经筵唱和诗序》，元刻明修本残卷、澹生堂抄本、荟要本、文渊阁本“闻者

①杨讷、李晓明：《文津阁四库全书金元别集类录异》，《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

杨、李二人还注意到两部《四库全书》所收174种金元文集中有一百余种在卷数或篇数上有出入。

②如元刻明修本卷二《次韵虞先生寄王真人》，文津阁本作《次韵寄王真人》，卷三《赋方叔高庐山木斋》二首，文津阁本只抄录一首；卷二《次韵苏伯修尚书孔庙庆成诗》至《送达天山江浙省检校》共11首诗，文津阁本皆缺。

③前述澹生堂抄本卷四、五、七篇目与元刻明修本差异处，文津阁皆与澹生堂抄本同，基本可以推断文津阁本后十卷的来源并非元刻明修本。

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亦未能查阅，其他传本（包括港台、海外）皆清抄本，皆源自元刻明修残本或《四库全书》本（可能是文渊阁本），可置不论。

皆为天子重讲官若此”，而金侃抄本、文津阁本“为”作“谓”。卷七《洞虚宫三元洞仙殿记》是陈旅为无锡洞虚宫三元祠山殿所撰碑记，诸本皆将“祠山”误作“洞仙”，看来这一讹误由来已久。2005年，无锡碑刻陈列馆翻修明伦堂时，在明碑《礼部钦依出榜晓示卧碑》的背面发现了这通碑，笔者将原碑与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通校一遍，发现三者几乎完全相同，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仅有笔误两三处，这是抄本很难避免的。

最后，谈谈对陈旅文集整理的意见。元刻明修本是今存陈旅文集最早的版本，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刊明修本《陈众仲文集》十三卷（卷八至十三配以清抄本，索书号：07114），所收诗文较全，学者们整理陈旅诗文，首先会考虑以之为底本，这是可以理解的^①，《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也是这个本子。但是，该本元刻明修部分仅七卷，其余六卷皆清抄，如果整理陈旅诗赋，将之作为底本，参校以金侃抄本的等版本，自无不可。如果整理陈旅的文章，元刻明修本仅存陈旅文四卷，另六卷皆为嘉庆初黄丕烈的清抄本，远不如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可靠。如前揭《洞虚宫三元洞仙殿记》，清抄唯一胜处为根据碑文内容将原篇名“洞仙”校改为“祠山”，原碑与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相合而清抄讹误者共六处，足见以其为底本之不妥^②。而澹生堂抄本与文津阁本后十卷，虽抄录时间有先后，但同出一源，后者收文多25篇，且参校别本，当为整理陈旅文集的最佳底本。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①《全元文》将陈旅文编为十三卷（卷一一六七至一一七九），整理说明云：“以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为底本，校以明祁氏澹生堂钞本《安雅堂集》，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安雅堂集》。”

②原碑：“盖三辰顺轨，川泽率职，寒暑节，风雨时，百物咸殖。”澹生堂抄本、文津阁本同，而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所配清抄本作“盖三辰顺敷，川泽率职，风雨节，寒暑时，百物咸植。”